

青少年创伤心理影视表征的情绪传播机制与行为模仿风险研究

孟杨¹ 陈矿¹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近年来,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对青少年创伤经验的呈现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叙事方向。校园欺凌、家庭失序、情绪障碍以及自我认同危机等议题在影视文本中的频繁出现,不仅推动了社会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也引发了关于媒介影响与行为模仿风险的广泛讨论。本文基于传播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视角,以社会学习理论、情绪感染理论和叙事认同理论为基础,对现实题材影视中的青少年创伤心理表征及其情绪传播机制进行系统分析。文章选取《少年的你》、《悲伤逆流成河》、《隐秘的角落》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影视文本如何通过情绪唤醒、角色认同与叙事沉浸等机制影响青少年受众,并进一步形成行为模仿倾向。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创伤叙事呈现出明显的情绪强化与视觉放大特征,其在提升社会共情与公共讨论的同时,也可能对心理结构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造成消极心理暗示。文章进一步提出创伤叙事伦理、媒介分级制度及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等优化路径,以期为影视创作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青少年创伤心理;影视表征;情绪传播;行为模仿;媒介影响

基金项目: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创伤群体心理与行为的影视表征及社会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XLYXW2026039),川北健康人文研究中心项目“疗愈电影的理论建构与跨学科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NC26CB78)和成都大学2024-2026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影视文学跨学科教学策略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cdjgb2024236)的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3

Research on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Behavioral Imitation Risk of Adolescent Trauma Psychology in Film and Television Representation

Meng Yang¹, Chen Kuang¹

¹ Affili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dolescent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 reali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ignificant narrative direction in popular culture. The frequent appearance of topics such as campus bullying, family dysfunction, emotional disorders, and identity crisi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texts has not only heightened public awareness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ssues, but also sparked widespread discussions on media influence and the risk of behavioral imitation. Drawing on perspectives from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and

作者简介:孟杨(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陈矿(198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心理、影视美学。

通讯作者:陈矿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nd grounded i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motional contagion theory, and narrative identity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dolescent trauma psychology in reali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nd its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Taking socially influential works such as *Better Days*, *Cry Me A Sad River*, and *The Bad Kids*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paper explores how film and television texts influence adolescent audiences through mechanisms of emotional arousal,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and narrative immersion, and how such influence may further generate behavioral imitation tendencies. Traumatic narratives in reali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exhibit pronounced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amplification and visual intensification, which, while enhancing social empathy and public discourse, may also impos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s on adolescents whos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s have yet to mature.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including traumatic narrative ethics, media rating systems, and adolescent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Keywords: adolescent trauma psychology; film and television representation;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al imitation; media influence

一、青少年创伤议题的媒介建构与影视研究的范式转向

(一) 青少年创伤议题的媒介凸显

随着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兴起,青少年成长困境逐渐成为影视文本的重要叙事资源。尤其在互联网平台与流媒体传播环境下,围绕校园欺凌、家庭暴力、抑郁焦虑以及原生家庭创伤等议题的影视作品不断进入公共舆论场。这些作品通过情绪化与视觉化的表达方式,使原本隐蔽的心理创伤获得社会可见性,同时也强化了公众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情感感知。

现实题材影视对创伤经验的再现,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情绪的文化表达。影视文本通过角色叙事、情绪渲染和符号建构,将个体心理创伤转化为具有传播性的公共情感经验。阿斯曼指出,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工具,同时也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其能够通过重复性的符号传播建构社会共同认知^[1]。在这一意义上,影视中的创伤叙事不仅关乎艺术表达,也关系到社会心理结构的形成。

(二) 影视影响与行为模仿的理论争议

关于媒介是否会诱发行为模仿的问题,学界长期存在争议。一部分研究认为,影视中的极端行为可能通过观察学习机制对青少年产生示范效应^[2];另一部分研究则强调,影视更多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映,而非行为发生的直接诱因^[3]。

事实上,影视影响并非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生成过程。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其认知结构与价值体系尚未稳定,更容易在情绪感染与角色认同过程中形成行为迁

移。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指出,个体能够通过观察媒介角色行为及其后果形成新的行为模式。因此,当影视文本以高度情绪化方式呈现创伤行为时,其潜在影响值得关注。

(三) 研究不足与研究路径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影视文本的社会意义分析,对“影视如何通过心理机制影响青少年行为”的讨论相对不足。尤其在创伤叙事领域,学界更多关注苦难书写与社会批判,而较少探讨情绪传播与行为模仿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媒介心理学角度构建“影视表征—情绪传播—行为模仿”的分析路径,重点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现实题材影视如何对青少年创伤进行表征;
第二,影视中的情绪传播机制如何作用于受众;
第三,行为模仿风险如何生成。

二、校园失序的影像书写与青春创伤的符号再现

(一) 校园权力结构中的创伤叙事编码

校园欺凌是现实题材影视中最典型的青少年创伤叙事类型,其本质并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暴力冲突,而是校园权力结构失衡下的群体性压迫机制。在多数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中,校园空间往往被建构为一种封闭性的社会场域,受害者在其中长期处于被凝视、被孤立和被规训的状态。这种空间压迫不仅塑造了角色的心理创伤,也强化了观众对“受害者处境”的情绪体验。

在《少年的你》中,影片并未将校园暴力单纯处理为个体恶意,而是通过集体围观、舆论冷漠以及制度失语构建了一种持续性的压迫结构。影片中陈念长期处于“被观看”的状态:教室、走

廊以及楼梯等校园空间均通过狭窄构图与压抑色调呈现,使角色始终处于无法逃离的精神困境之中。福柯在“规训空间”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行并不总是通过直接暴力完成,而是通过空间秩序与持续监视实现个体驯化^[4]。影片中的校园环境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隐性的权力场,受害者在这种结构中逐渐失去自我表达能力。

与此同时,影视作品通常会通过“沉默机制”强化创伤感。在《少年的你》中,无论是教师的回避态度,还是同学的集体旁观,都形成了一种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阿伦特认为,群体性冷漠比直接暴力更容易造成个体心理崩塌,因为其意味着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彻底失语^[5]。这种叙事策略能够有效增强观众的情绪代入,使校园创伤从个体经验转化为社会情绪经验。

相比之下,《悲伤逆流成河》则进一步强化了网络舆论与校园权力的联动关系。影片中,谣言传播与网络暴力共同构成了角色心理崩塌的重要原因。数字媒介在其中不再只是信息工具,而成为校园暴力的放大装置。传播学研究指出,互联网环境中的匿名性与群体效应会强化情绪攻击行为^[6]。影片通过手机屏幕、聊天记录以及短视频传播等媒介元素,使“创伤”呈现出公共化与持续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题材影视往往倾向于通过极端化情节增强戏剧冲突。例如影片中受害者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结局,虽然强化了情绪震撼力,却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校园创伤简化为“悲剧宿命”,从而削弱对社会结构问题的深入讨论。

(二) 家庭关系失序的心理创伤再现

除校园空间外,家庭结构失序同样是现实题材影视中青少年创伤的重要来源。家庭不仅是青少年人格形成的核心空间,也是情感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当家庭关系长期处于冷漠、冲突或暴力状态时,青少年容易形成持续性的心理创伤。

在《隐秘的角落》中,家庭关系的破裂构成了角色心理异化的重要基础。剧中多个青少年角色均处于缺乏情感支持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关系疏离、教育方式失衡以及情感忽视共同造成了角色的心理失序。鲍尔比的依恋理论指出,儿童与父母之间稳定的情感联结是人格安全感形成的重要基础^[7]。当这种联结缺失时,个体更容易出现焦虑、敌对与行为偏差。

该剧在叙事上采用了大量封闭空间镜头,如狭窄房间、阴暗楼道以及压抑性的家庭布局,以此强化角色的孤独感。镜头语言在此不仅承担叙

事功能,也成为心理创伤的视觉表达。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形式本身即意义的一部分^[8]。在现实题材影视中,空间形式与情绪表达之间往往形成高度关联。

此外,现实题材影视中的父母形象通常呈现出“功能失调”特征。一部分父母角色长期缺位,另一部分则表现出过度控制与情感压迫。这种“失衡型家庭关系”使青少年角色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稳定认同,进而导致其对现实关系产生不信任感。需要指出的是,影视作品对家庭创伤的呈现通常带有明显的情绪强化倾向。为了增强戏剧效果,创作者往往集中呈现家庭冲突中的极端时刻,而较少展现日常修复过程。这种表达方式虽然增强了观众的情绪震撼,但也可能导致青少年观众对现实家庭关系形成悲观认知。

(三) 情绪障碍的符号化表达机制

近年来,现实题材影视对抑郁、焦虑以及情绪失调等心理问题的呈现显著增加。这种趋势一方面提升了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另一方面也使“创伤”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传播价值的情绪符号。

在多数现实题材影视中,情绪障碍往往通过视觉符号加以呈现。例如阴暗色调、封闭空间、长时间静默以及重复性独白等,均成为表达角色心理压抑的重要手段。这种符号化表达使抽象心理问题获得了可视化呈现,但同时也存在将复杂心理机制简单化的风险。

在《悲伤逆流成河》中,角色长期处于灰暗环境之中,影片大量采用冷色调与慢镜头,以此强化抑郁情绪的蔓延感。波兹曼认为,视觉媒介时代中的情绪表达往往优先于理性表达^[9]。影视作品通过符号化手段快速激活观众情绪,但这种高度情绪化的表达也容易削弱对心理问题复杂性的深入呈现。

与此同时,部分影视作品倾向于将“痛苦”浪漫化。例如通过唯美镜头、诗化台词以及青春化叙事,将创伤经验包装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情绪体验。这种“苦难美学”虽然能够增强艺术感染力,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创伤问题的现实严肃性。

(四) 极端行为的视觉强化与叙事放大

极端行为是现实题材影视创伤叙事中最具传播性的内容之一,包括自伤、自杀以及暴力反抗等。由于其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因此往往成为影片中的情绪高潮部分。班杜拉指出,媒介中的

行为示范会对观众产生观察学习效应^[10]。当影视作品频繁强化极端行为时,部分青少年观众可能将其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行方式。尤其对于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的青少年而言,这种视觉强化容易形成心理暗示。

在《少年的你》中,角色通过极端方式完成“反抗”与“自我保护”,影片虽然最终指向社会批判,但其对暴力行为的视觉强化仍然可能对部分观众产生情绪刺激。传播学研究表明,视觉暴力越具有情绪合理性,观众越容易降低对其后果的理性判断^[11]。因此,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创伤表征既具有社会警示价值,也存在潜在模仿风险,其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呈现创伤”,而在于如何平衡艺术表达与社会责任。

三、视听符号的情绪唤醒与媒介共情的扩散逻辑

现实题材影视对于青少年创伤心理的传播,并不仅仅停留在“内容再现”层面,其更深层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视听语言、叙事结构与媒介传播路径构建情绪感染系统,从而影响观众的心理认知与情绪体验。尤其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影视文本的传播已经突破传统影院或电视媒介的单向传播模式,而是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与网络社区中形成二次传播与情绪扩散。青少年受众在这一过程中,不再只是信息接受者,而逐渐成为情绪传播链条中的参与者与再生生产者。因此,对影视创伤表征的研究,需要从单纯文本分析进一步转向“情绪传播机制”的讨论。

(一) 视听语言中的情绪唤醒机制

影视作品中的情绪传播首先依赖于视听语言所形成的感官刺激。镜头调度、色彩系统、音乐节奏以及空间构图等元素,都会对观众的情绪感知产生直接影响。德勒兹指出,电影并不仅仅是讲述故事的媒介,其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机器”,能够通过影像运动调动观众感知系统^[12]。因此,在现实题材影视中,创伤情绪的传播往往不是依靠角色对白完成,而是通过整体视听氛围实现。

在《少年的你》中,影片大量采用低饱和度和色彩与手持摄影,以此强化角色的不稳定状态。影片中的校园空间长期处于灰暗色调之中,狭窄楼道、逼仄教室以及高密度近景镜头共同构成了压迫性的视觉环境。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不自觉进入角色的情绪结构之中。这种情绪唤醒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感官沉浸,它能够绕过理性分析,直接作用于观众情绪系统。

音乐同样是情绪传播的重要媒介。现实题材影视通常通过低频背景音乐、重复性旋律以及突然的静默处理强化情绪波动。科恩认为,影视音乐能够在观众尚未形成明确认知之前率先激活情绪反应^[13]。在《悲伤逆流成河》中,悲伤旋律与缓慢节奏反复出现,使影片整体始终笼罩在压抑氛围之中。这种持续性的情绪暗示,会逐渐强化观众对“痛苦”的情绪认同。

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创伤表达往往倾向于“情绪优先”。也就是说,作品首先追求观众情绪震荡,其次才是理性思考。这种表达方式虽然提升了传播效果,但也容易造成情绪过载。尼尔·波兹曼指出,在视觉媒介时代,娱乐化逻辑会不断强化感官刺激,从而削弱公众的理性判断能力^[14]。当创伤情绪被不断放大时,观众可能陷入持续性情绪感染之中。

(二) 叙事沉浸与情绪共振机制

影视情绪传播的核心,并不只是感官刺激,而是通过叙事沉浸形成观众与角色之间的情绪共振。格林与布洛克提出“叙事沉浸”概念,认为观众在进入故事世界后,会暂时中断对现实的判断,并在情感上与角色建立联系^[15]。这种沉浸机制使影视作品能够突破现实经验限制,直接作用于观众心理结构。

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创伤叙事,通常采用“受害者视角”推进情节,以此增强观众的情绪代入。例如《少年的你》始终围绕陈念的心理体验展开,观众看到的并非“校园暴力事件本身”,而是受害者长期处于恐惧中的精神状态。这种主观化叙事方式能够有效强化观众共情。

与此同时,现实题材影视往往会通过“情绪延迟”增强沉浸感。创作者并不会在一开始就直接展示创伤结果,而是通过不断积累压抑情绪,使观众逐渐进入角色心理结构。伊瑟尔认为,文学与影视接受本质上是一种“空白填补”过程,观众会主动参与意义建构^[16]。当影片不断制造情绪悬置时,观众会在心理上持续参与角色命运,从而形成更强烈的情绪共振。

这种情绪共振具有明显的社会传播属性。尤其在网络平台环境下,观众会通过弹幕、评论与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情绪体验,使原本个体化的观看行为转化为群体情绪表达。情绪在这一过程中不再只是个人感受,而逐渐形成一种“公共情绪结构”。

(三) 角色认同与心理投射机制

影视情绪传播之所以能够影响青少年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角色认同机制。认同并不仅仅意味着“喜欢角色”,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投射过程。科恩指出,观众在观看影视作品时,会短暂地将角色视为“自我延伸”,并在情感与价值层面与角色形成一致性^[17]。对于青少年观众而言,这种认同关系尤为明显。青少年阶段正处于人格认同形成时期,其心理结构尚未稳定,更容易通过媒介角色寻找情感参照。当影视中的创伤角色与观众现实经历相似时,认同关系会进一步强化。例如在《悲伤逆流成河》中,角色长期遭受校园孤立与网络暴力,这种情境与部分青少年现实经验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更容易激发“镜像认同”。

拉克提出,“镜像阶段”中的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映射^[18]。影视角色实际上成为观众情绪与欲望的投射对象。当青少年将自身压抑情绪投射到影视角色时,角色行为便可能获得“合理化”解释。这也是为何部分现实题材影视容易引发观众对极端行为的情绪理解。

此外,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弱者叙事”往往具有天然情绪优势。观众通常会站在受害者立场理解其行为逻辑,从而降低对极端行为的批判意识。当创伤角色最终通过暴力、自毁或极端反抗完成情绪宣泄时,观众可能会在潜意识层面形成行为认同。

(四) 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情绪扩散机制

在短视频与社交媒体时代,影视情绪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作品本身,而是进入碎片化与二次传播阶段。大量影视片段通过剪辑、配乐与情绪标签在网络平台中循环传播,使创伤情绪进一步放大。

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中的传播具有高度流动性,情绪能够在节点之间快速扩散^[19]。现实题材影视中的高情绪片段往往更容易获得流量支持。例如哭泣、自伤以及情绪崩溃等片段,因其具有强烈情绪冲击力,通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中的“高传播内容”。这种传播机制会进一步强化情绪消费逻辑。创伤叙事不再只是社会问题讨论对象,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具有流量价值的情绪商品。博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媒介符号会脱离现实语境,成为可循环消费的情绪景观^[20]。当创伤经验被不断视觉化与娱乐化时,其原本的社会批判意义也可能被消解。

因此,现实题材影视中的情绪传播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提升了社会对青少年心理问题

的关注;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在情绪放大与媒介消费过程中,对青少年受众形成潜在心理暗示。

四、角色认同的行为内化与模仿风险的社会生成

现实题材影视中的青少年创伤叙事,不仅是对社会问题的艺术再现,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心理影响机制。尤其在情绪传播与角色认同不断强化的情况下,影视文本中的行为表达可能逐渐进入青少年观众的认知系统,并在特定情境下形成行为迁移。需要指出的是,行为模仿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生成过程,其背后涉及观察学习、情绪认同、情境代入以及社会传播等多重机制。因此,对于影视创伤叙事的讨论,不能仅停留于文本层面的“是否真实”,更需要深入分析其行为影响路径及社会风险结构。

(一) 观察学习中的行为编码机制

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指出,个体能够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形成新的行为认知,并在适当条件下进行行为再现。影视媒介中的角色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行为模型”,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对角色行为进行心理编码。当观众与角色形成情绪认同后,这种行为编码便可能进入其潜意识层面。

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这种观察学习效应更为明显。青少年阶段处于人格认知与价值观形成时期,其行为判断尚未完全成熟,更容易将影视中的行为逻辑视为现实参考。尤其是在现实题材影视中,创伤角色通常被塑造成“值得同情”的弱者形象,观众往往倾向于站在其情绪立场理解行为动机。这种情绪合理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极端行为后果的理性判断。

在《少年的你》中,影片虽然试图通过社会批判揭示校园欺凌问题,但角色最终通过暴力实现“反抗”的情节,仍然可能被部分观众视为一种有效解决路径。周星指出,现实题材影视中的“情绪真实性”容易强化观众的代入感,使影视行为获得现实意义上的心理可信度。当影视中的极端行为与观众现实情绪产生对应关系时,行为编码过程便会进一步强化。

影视中的“后果弱化”同样会影响行为认知。一部分现实题材影视为了维持叙事节奏,往往淡化极端行为的长期后果,而突出其情绪宣泄效果。例如角色在实施暴力或自毁行为后,影片更强调其情绪释放,而较少呈现后续心理创伤与社会代

价。这种叙事倾向容易使青少年形成“行为有效性”的错误认知。

（二）角色认同驱动的行为内化路径

行为模仿的生成，并不仅仅依赖于行为观看本身，更重要的是角色认同所带来的心理内化过程。认同意味着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将角色视为自身情感与经验的投射对象，并在心理层面形成“替代性体验”。

陈旭光认为，现实题材影视中的“青春叙事”往往具有高度情绪感染力，其原因在于观众能够在角色身上看到自身成长焦虑与社会压力。尤其对于存在现实困境的青少年而言，影视中的创伤角色容易成为情绪寄托对象。当角色长期处于压抑、孤独与失语状态时，观众会在情感上形成共鸣。

在《悲伤逆流成河》中，角色长期遭受校园排斥与网络羞辱，其“孤立感”被反复强化。影片通过大量主观镜头与情绪独白，使观众进入角色内部心理空间。这种叙事方式会在无形中强化观众的角色认同。

心理学研究表明，认同程度越高，观众越容易接受角色行为逻辑。也就是说，当观众已经在情感上认同角色时，其行为本身也更容易被视为“合理反应”。这一点在现实题材影视中尤为突出。由于创伤角色通常被赋予“受害者身份”，观众会天然降低道德批判意识，从而强化对其行为的情绪理解。部分影视作品存在“苦难浪漫化”倾向，即通过唯美镜头与诗意表达，将角色痛苦包装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情绪体验。这种表达方式虽然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但也可能使青少年观众对痛苦与极端行为形成错误审美认知。

（三）情境迁移中的行为再现逻辑

影视行为影响并不会在观看结束后立即消失，而是可能在现实情境中被重新激活。尤其当观众现实经历与影视情境存在相似性时，影视中的行为模式更容易被迁移至现实生活。李彬指出，媒介传播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情境触发性”特点，即个体在现实压力状态下，更容易调取媒介中的行为经验。例如，当青少年在现实中遭遇校园孤立、家庭冲突或情绪压抑时，影视中的创伤叙事可能成为其理解现实的重要参照。

在《隐秘的角落》中，青少年角色长期处于缺乏情感支持的成长环境，其行为逐渐从心理压抑走向道德失控。虽然作品本身具有强烈现实批

判色彩，但其对于“压抑—反抗”路径的强化，也可能对部分青少年形成潜在暗示。

尤其在短视频传播环境下，影视中的高情绪片段会脱离原有叙事语境，被单独剪辑与传播。例如哭泣、自伤以及极端冲突场景，往往因为情绪浓度较高而获得更多流量。这样一来，观众接触到的并不是完整叙事，而是被高度情绪化的“碎片内容”。这种碎片化传播会进一步强化情绪刺激，而削弱对行为后果的理性理解。

传播学研究认为，媒介环境中的重复暴露会强化行为印象。当青少年长期接触相似创伤情节时，其对极端行为的心理敏感度可能逐渐下降，甚至形成“行为正常化”认知。

（四）行为模仿风险的社会结构性影响

影视创伤叙事的行为影响，并不仅仅停留于个体层面，其还会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形成群体性社会情绪结构。尤其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情绪传播已经突破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逻辑，转而形成网络化扩散。

一方面，影视中的创伤情绪会在网络平台形成“情绪聚集效应”。观众通过弹幕、评论以及社交媒体互动不断强化彼此情绪体验，从而形成集体性情绪共振。彭兰指出，社交媒体时代的情绪传播具有明显“共情聚合”特征，即情绪会在群体互动中不断放大。另一方面，创伤叙事还可能逐渐演变为一种“流量消费”。部分平台在算法推荐机制驱动下，更倾向于推送具有强情绪刺激性的内容。这样一来，创伤经验便从社会问题转变为可被消费的情绪景观。

影视中的“受害者叙事”若被过度强化，也可能导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受害者认同”。即个体倾向于将自身现实问题全部归因于外部压迫，而忽视积极的心理调适与社会沟通。这种认知结构容易强化消极情绪循环。因此，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创伤叙事既具有社会警示价值，也存在潜在风险。其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呈现创伤”，而在于如何在艺术表达、社会责任与青少年心理保护之间建立平衡。

五、结语

现实题材影视中的青少年创伤叙事，本质上是社会心理问题在媒介文化中的集中呈现。影视作品通过情绪传播与角色认同机制，使创伤经验获得公共表达空间，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少年的认知与行为。本文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与情绪传播理论，构建了“情绪—认同—模仿”的分

析路径,揭示了影视表征与行为模仿之间的心理机制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影视并非行为问题的唯一诱因,其影响往往与家庭环境、社会结构及个体心理状态共同作用。因此,对媒介风险的讨论不应停留于简单归因,而应从创伤叙事伦理、媒介分级制度以及青少年心理支持体系等层面展开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 [1] Assmann J.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41.
- [2] Bandura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7: 22-26.
- [3] Potter W J. Media Effect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12.
- [4]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95-228.
- [5]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50-58.
- [6]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2010: 407-459.
- [7]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177-209.
- [8]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7-21.
- [9] Postman 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3-20.
- [10] Bandura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7: 22-26.
- [11] Potter W J. Media Effect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12: 3-18.
- [12] Deleuze G.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65-79.
- [13] Cohen A J. Music as a Source of Emotion in Film[M]//Juslin P N, Sloboda J A. Handbook of Music and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879-908.
- [14] Postman 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87-98.
- [15] Green M C, Brock T C.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Persuasiveness of Public Narrativ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5):701-721.
- [16] Iser W. The Act of Reading[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163-179.
- [17] Cohen J. Defining Identification: A Theoretical Look 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Audiences with Media Characters[J].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1(3):245-264.
- [18] Lacan J. Écrit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75-81.
- [19]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2010: 407-459.
- [20] Baudrillard J. The Consumer Socie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25-34.